

集中資源谷區議會方案

□李希敏

「區議會方案」比之於二〇〇八年的立法會選舉，增加了不少民主元素，因而值得各方支持。現時，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和某些黨派人員，還在提「二〇一二年雙普選」，此舉肯定是枉費心機。與其虛耗人力物力及資源，倒不如用於「區議會方案」，若能以此途徑爭取多幾個立法會議席，不亦樂乎？



剛剛公布的政改諮詢方案，由於既涉及二〇一二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又涉及二〇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兩者雖均不涉普選，但諮詢的內容和項目仍有多個方面，堪稱相當豐富，可供市民及各黨派、各社團理性討論，並向政府提出各自的意見或建議。

會獲主流民意贊同

在政改諮詢方案的大框架之中，又有一些涉及某一方面的小方案，例如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提名門檻等。其中一項小方案，被人稱之為「區議會方案」。簡單說，政改諮詢方案提出立法會新增十席，由六十席增至七十席，仍是分區直選及功能界別各半，即分區直選增加五席，功能界別也增加五席，這五席則全部撥歸「區議會功能界別」。具體做法大致是，由區議會中大約四百名民選區議員，以一人一票及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這五名新增的立法會議員。委任區議員無投票權，亦無被選舉權。簡言之，就是在民選區議員中再互選產生多五名立法會議員，此之謂「區議會方案」。由於有投票權和被選舉權的全部是由直選產生的民選區議員，這個「區議會方案」的民主程度是相當高的。值得指出，世上多個國家的總統、主席、總理、首相都是以這種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的。美國、英國、日本等都是如此。推論之下，相信「區議會方案」會獲得本港主流民意的贊同。

從技術上說，不論是各個政黨，或者是建制派與反對派兩大陣營，只要是誰掌握了民選區議員中的多數，或獲得足夠數量的支持票，誰就可以成為「區議會方案」的贏家，或者說，可以透過「區議會功能界別」獲得新增的立法會議席。假如這是一塊大餅，誰想分得一塊甚至分得最大的一塊，那就

必須要在民選區議員這方面多下一些苦功了。舉例說，倘若某一陣營佔有過半數的民選區議員，這新增的立法會五席，不全是「囊中之物」了嗎？當然，說說容易做就難。目前，對各黨各派的機會是均等的，其中並無任何「親疏有別」的成分，因為政府不可能幫誰去競選區議員。

成為民選區議員與成為立法會議員一樣，難度是相當高的，甚至比個別只得一名候選人的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難度高得多。想做民選區議員，地區工作、基層工作是少不了的，否則到時誰會去投此人一票？再者，這裡面還有一個需要「長期耕耘」的問題。倘是「空降」，本身又不是「政治明星」，且在這區沒有強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而能成為民選區議員，吾未見之矣。淺見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此則說明，能成為民選區議員，也得有「天時、地利、人和」，而且是多年辛勤工作的結果。作為民選議員，其從政之路所包含的辛勞、辛苦、甚至辛酸，必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也。

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下屆區議會的選舉是在二〇一一年。說句笑話，這剛好是二〇一二年立法會選舉的前奏，至少對「區議會功能界別」的前景有很明顯的預示作用，主要就在於民選區議員政治傾向構成比例如何。即：有多少百分比屬建制派，有多少百分比屬反對派，這些都是立場取態比較明朗的部分議員。此外，也有所謂「中間派」的獨立議員，但他們多數在兩大陣營的坐標上多少總會表現出某個程度的傾斜。世上，真正絕對「中立」的人極少。絕對中立，試問又如何在投票時作出抉擇？到選舉時，民選區議員的傾向性，自會有政界人士「爆料」，或者有選舉專家或學者一一加以分析。既然立法會「區議會功能界別」增加五席，佔全部議席的百分之七，比例不能說小，必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有政壇消息指，一些

政黨政團，已經在着手進行二〇一一年區議會選舉的布局。一切要早。理由有三：其一，區議會本身也是值得爭取和必須爭取的政治地盤，況且區議員在地區工作方面也有一定的權力和相當的影響力；其二，既然民選區議員有權選舉立法會議員，那就更加非爭取多幾名民選區議員成為「自己人」不可了；其三，凡事都要早作準備，基本上可說是「越早準備越好」。特別是民選區議員做的是基層工作，堪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早些布局，早些開展，才能讓市民(選民)對自己有更多、更好的認識，這是他日選舉時能否勝選或能否連任的關鍵。就選舉時要贏得選民支持而言，「臨時抱佛腳」肯定是不行的，盡早多做基層的準備功夫，多為該區的市民服務方是正道，他日就可獲得市民(選民)信任和回饋的一票。

增加不少民主元素

由民選區議員選舉立法會「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員，雖不是直選或普選，但這一方式的選民基礎也間接遍及全港，相當廣闊。就二〇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而言，因為有「區議會方案」，明顯是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按照《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為最終達至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目標，政制發展一要「根據(特區)實際情況」，二要遵照「循序漸進」的原則。以筆者觀之，「區議會方案」當然不是「原地踏步」，作為最早二〇二〇年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其中一個台階，那就是「循序漸進」了。非常明顯，「區議會方案」比之於二〇〇八年的立法會選舉，增加了不少民主元素，因而值得各方支持。政改諮詢剛開始，但筆者估計，最終的主流民意會認同「區議會方案」。

現時，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和某些黨派人員，還在提「二〇一二年雙普選」，此舉肯定是枉費心機。這恐怕是盲人也能夠看得一清二楚的事。現實一些說，這些虛耗的人力物力及資源，倒不如用於「區議會方案」，若能以此途徑爭取多幾個立法會議席，不亦樂乎？

陳 Sir，有網民成立自殺群組，有什麼看法？

嗯……



珍惜生命

· 三 龍 ·

澳門經濟有待矯形



澳門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全憑突然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何以突然？何能高速？是否無聊地增長、持久地增長？在短短幾年內，澳門由香港的小弟弟，變成大阿哥，變成亞洲的暴發戶。猶記回歸時的一九九九年，澳門的人均生產值，只及香港的五成半，只和台灣相若，和台灣不相同的是，澳門人所賺的，有相當部分外流到香港。但自〇六年開始，已在香港之上，到了〇七年，更超越亞洲首強新加坡與首富文萊。

經濟上與內地融合

澳門今天的經濟成就，就全憑十二字：走進祖國，走離香港，走向世界。在一九九五年，新機場未啓用以前，澳門的遊客只有七百多萬，而八成來自香港，賭客亦有六成來自香港，經營賭場的公司，以至東主，都主要來自香港。其時的內地遊客，每年只有幾十萬，來自台灣的更少。但自台澳航線開辦以後，台灣遊客突然多起來，居遊客總數的第二位，雖然大部分是轉機往大陸。因此到了九九年，香港遊客只佔六成左右。

到〇三年，內地逐漸開放各省市去澳門的自由行，內地遊客湧入澳門，在八年內增加了二十倍左右，佔遊客總數的五成半左右，香港只佔三成。在此期間，內地不少商人來澳，開設公司，中資銀行亦主導了澳門的金融業，澳門比香港更快在經濟上與內地融合。

賭權的多元化，使賭業向香港以外的外資開放，更使澳門進一步走向國際。所謂外資，主要是美資，譬如金沙與威尼斯人，因為只有美資才精於賭業，把拉斯維加斯經營的那一套方式搬來澳門。這一套方式，和傳統有別，因此澳門已局部走離香港，同時亦走向世界。

但走向世界的同時，澳門應注意到，世界各地經營賭業的模式，一般來說，賭場大部分開設在偏遠、較難到達的地方。馬來西亞的賭場在雲頂高原，拉斯維加斯亦在內華達州偏遠的沙漠，新加坡國家太小，只可開設於靠岸的聖淘沙島。但本地人進入是有若干限制的，因此這些賭場，絕大部分是供遊客玩樂。拉斯維加斯雖稱賭城，但嚴格來說，只是賭城，在特定的專區內，開放多家賭場，提供相關的設備，因此拉斯維加斯的人口，不到澳門的三成，且差不多全部的工作，都和賭業有關。賭業只是美國經濟極小的一環，萬一走下坡，絕不影響整體的經濟。

保持賭業繼續增長

澳門則不然，澳門博彩業的收益，幾年間增加了幾倍，佔生產總值的比例，由九九年的兩成半，增加至〇八年的六成半。在九九年，所佔財政的收入只有不到兩成，到了〇八年，竟然佔八成半。催谷經濟、養肥政府的，就全憑單一業的賭業。賭業及相關服務業所僱用的人口，由〇三年的兩萬四千暴升至〇八年的八萬，佔了就業人口的兩成半。因此正確地說，澳門到了今日，是以賭謀生。

但與拉斯維加斯最大的不同是，拉斯維加斯只是一個經濟的異體，市長只稱為議會經理，完全是經濟的結構，澳門卻是一個政治的個體，有完整的行政架構，是中國以內的一個特區，首長稱為行政長官。賭業並不能代表澳門的一切，只可作為經濟的一環，因此賭業的收益，只能佔生產總值一半，最好是低於一半的比例。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澳門已不能失去賭業，亦不能減少賭業，否則澳門會下沉。唯一的做法，是讓賭業繼續增長，與此同時，是加速經濟其他方面的發展，進行凱恩斯所主張的經濟微調，在微調的過程中，推升經濟的矯形手術。

何謂經濟的其他方面？在過去幾年，博彩業以外，增長得最快的是建築業，因為它是博彩業的附體，



示願意押後總辭時間；其後朝令夕改，又即時收回「讓步方案」。

敢於唱反調

公民黨亦手忙腳亂，原計劃派發一期在頭版宣布梁家傑及陳淑莊辭職消息的黨報《A45》，不得不因為要「停一停、諗一諗」而暫時放一邊。騎虎難下的黨魁余若薇藉機以「大局為重」之堂皇理由，表示不會在得不到其他反對派同意的情况下自行請辭，從而為將來「下虎」鋪定一條路。

不過，同樣身處亂局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依然無動於中，因為他無須「動」，無須調整自己的立場和做法。自公民黨宣布與社民連綁在一起玩總辭的那一天起，湯少就公開反對黨的偏激路線，而且是黨內唯一一個敢於唱反調的核心成員。

總辭遊戲的「黑手黨」見光後，反對派分化加劇。湯少再次在個人網誌中，批評包括公民黨在內的反對派一些人，計劃以「五區總辭」抗衡政改。他引述近日一項獨立的民意調查並說：反對總辭的香港選民比支持的多以倍計。這正證實了他在七月時指出，最令人擔心的莫過於五區總辭，以至二十三名議員總辭，不但分化了民主黨派，更嚴重分化了支持民主的香港人。湯少又指出，「五區總辭」是一條「不歸路」，非爭取最大公約數和大多數人支持的好辦法，不但分化了立法會，更嚴重分化了香港人；而反對派近日的言行更令人「痛心疾首」。

不做殉葬品

推「五區總辭」，等於自行將政制發展的談判大門關上，在政治上必然是「不歸路」，而且根本得不到港人支持。不僅反對派內部多數黨派反對總辭，「反對總辭的香港選民亦比支持的多以倍計」。民意十分清晰，公民黨等仍然逆民意而行，還以「民主領袖」自居去愚弄港人，這更是一條「不歸路」。湯少當然不會願意做「不歸路」上的殉葬品。



粵劇演出三地聯票

□白 沙



廣東省與東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交流會，不久前在佛山舉行，東盟七個國家的文化官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與廣東省的專家，共同探討如何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目前的熱門話題。廣東省專家提出對粵劇保護和傳承，引起與會者關注，成為交流會一個熱點。參加會議的香港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甄美薇表示，保護和傳承粵劇無可否認必須受到粵港澳三地共同重視。三地粵劇既有共通性，又各有特色，促進發展更應視為共同任務，可以做的事情不少，但必須抓住要點，才能發揮最大作用。就粵港澳三地如何為粵劇的發展合作努力，明顯聚焦在促進三地粵劇演出聯票上，三地粵劇界正緊鑼密鼓探討中，共識之下面對的多是技術性問題。因此，推出三地粵劇演出聯票已被粵劇界和粵劇發燒友視為必成事實。平情而論，粵劇要走向國際層面，要受到國際藝術界欣賞，港澳可以發揮的窗口作用明顯大於廣東，但是，論粵劇的表演質素及發掘劇目優勢，無疑則是廣東省的專長較港澳強。這正是三地共同推動粵劇發展的最大動力，也是令粵劇走向更廣闊天地的最有利因素。

歐美的藝術表演，聯網購票成為最常用的推銷方法，它可以令對某種藝術表演具興趣的不同國家的觀眾利用網絡獲得欣賞的機會，其最大的便利是各國互通無阻。把這樣的做法放在粵港澳三地，便大有與之相同的優勢。港澳民眾前往廣東並不存在什麼困難，廣東居民在目前越來越便利的過境手續之下，到港澳觀賞粵劇也不存在困難，這就為三地推動粵劇票聯票創造最有利條件，對於增強三地粵劇交流和觀摩有顯著的

□黃康顯

為了擴充博彩業，需要聘用大量工人，去建築賭場、酒店及相關的設施。如是建築業的就業人口，由〇三年至〇八年，增幅有一倍半，未來政府大可增加基建工程，去吸納剩餘的建築工人。

旅遊業亦是博彩業的附體，旅客的人數，由九九年的七百萬左右，急增至〇七年的二千七百萬左右，和香港相若。但和香港不相同的是，旅客停留的時間，澳門少了一半以上，雖然由〇三年到〇七年，已由平均的一點二六天增加至一點五天，原因可能是澳門已獲聯合國確認為一個歷史城區，澳門亦在這方面多做宣傳的工作的緣故。

並非不能發展工業

相對博彩業，澳門的製造業正不斷萎縮，製造業的擴展是七十年代，全盛是八十年代。八二年的進出口總額是八十九點二億澳門，八五年已增至一百三十三點六億澳門。製造業所佔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略過兩成，與博彩業不分伯仲。但九〇年代興起炒風，作為龍頭的製衣與紡織業，九七年的工廠與工人數目，比起九〇年下跌了四成上下，就業工人，由全盛時期的七萬多人，減少至〇三年的三萬七千多人，再減少至〇八年的二萬四千多人，是全盛時期的三成左右。究竟澳門是否不能發展工業？非也，否則不會出現二十年前的輝煌，只是澳門不務正業。

很多澳門人精通葡語，全球的葡語國家，多達八個，人口有二億多，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澳門可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橋樑，只可惜澳門在這方面做得不夠。觀乎〇七年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已有四百六十三點四億美元，比〇六年增長了三成六，但澳門只佔不到其中的兩成。

經濟矯形的最終，是貿易、製造業與旅遊業相對於博彩業，有平衡的發展，所佔生產總值的比例，不應低於博彩業。

作者為資深教授，博士

唯憲制能治「民主狂犬症」

□黃熾華

「民主的狂犬症」，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民主政治理論家亨廷頓（P.Huntington）在1975年發表的《美國的民主危機》中，批評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者各種表現所使用的詞彙。當時流行的「民主平等主義」造成了美國政府管治能力削弱，國力每況愈下的混亂局面。亨廷頓的批評，與今天香港的狀況比較，有極相似之處：香港式的「民主狂犬症」愈演愈烈，故必須尋找療救的藥方。

借鑒美經驗

先回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者鼓吹什麼？六十年代初，自由派於大戰後首度控制政府。自由派一反五十年代的安定、繁榮和傳統、道德價值觀，大肆鼓吹「反傳統」、「反權威」、「反倫理」、「反制度」、「人人應參與政治」、「人人參與政府的決策」等等，於是出現危害美國民主政治的各種風潮。結果使政府變得無能，難以駕馭社會出現的各種複雜局面，GDP由五十年代佔世界的40%—45%至六十年代末下降至20%—25%，國力衰落，外交挫敗，科技停頓。亨廷頓教授形容這是沒有受制約、各人和各利益集團為私利而貪婪的「民主狂犬症」，使美國社會陷於驚濤駭浪、岌岌可危之中。

用這種情形比照香港，歷史有相似重複之處。港英統治一百五十多年，沒有人敢要英殖民統治者給與香港民主政治。港督、立法會委員都由英女王空降，由港英當局委任。只是到了香港快要回歸中國的前兩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才別有用心地進行「政改」，為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而安下各種釘子，摻下一批沙子。中國政府比英國更理解港人對民主的訴求，在《基本法》中，第一次寫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民主目標。中央政府定下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一些人以為有機可乘，或沉渣泛起，或私利相投，紛紛組黨或結合成團體。其中以社民連、民主黨、公民黨結成的「泛民主派」最典型，在香港回歸十二年來，高叫「民主」口號，要求民主「一步到位」，妄圖奪取香港特區政府權力。在末實現之前，煽動、組織反中亂港各種遊行，找各種藉口反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煽動大學校園學生騷亂，支持「藏獨」，搞反對中央政府的什麼「國殇」活動。

種種無法無天的「民主狂犬症」發展到今日，要以「五區請辭」、「公投」向中央政府施壓，妄圖推翻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定下的民主普選時間表，達到明修「民主」棧道，暗度「奪權」陳倉的目的。

憲制是良方

在反對派的干擾下，香港特區政府成弱勢政府，施政從不順暢，「一國兩制」落實困難重重，經濟措施難以難決，嚴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怎麼辦？看看美國的經驗：以里根為代表的保守黨八〇年上台，採取一系列措施撥亂反正。其一，理論上劃分保守黨和自由主義的差別。里根政府把「阻嚇犯罪，保護善良」作為施政目標之一，結果從八二年開始，罪案開始下降。其二，美國能維持社會多元政治下的長治久安是法律權威。而司法權威是多元社會的最高準繩。其三，認定美國制憲的先賢所屬，將國家最高主權寓於憲法成文的法律中。其四，澄清了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界限：思想自由是絕對的應受尊重，言論自由因影響了別人 and 社會，因而是相對的應予約束。里根政府在位八年，美國社會穩定了，施政順利了，傳統良好道德發揚了，生產上去了（GDP增加了25%），失業率降至5.1%，科技發達了，國力強盛了！美國的經驗證明：憲制下規定的法律，是長治久安的基石。

香港《基本法》的制訂以及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民主選舉的時間、規定，具憲制的法律效力：第一，確保香港在一國的主權前提下實施兩制；第二，平衡了各派政治組織的利益；第三，維護着香港的繁榮穩定；第四，是香港長治久安的基石。社民連和公民黨策動的「總辭」和變相「公投」，是諸種「民主狂犬症」的一次最瘋狂的表演。治療它只有堅持《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有關普選的規定。如果社民連等組織拒絕此鐵定療方，再癲狂下去，就只有自食惡果！